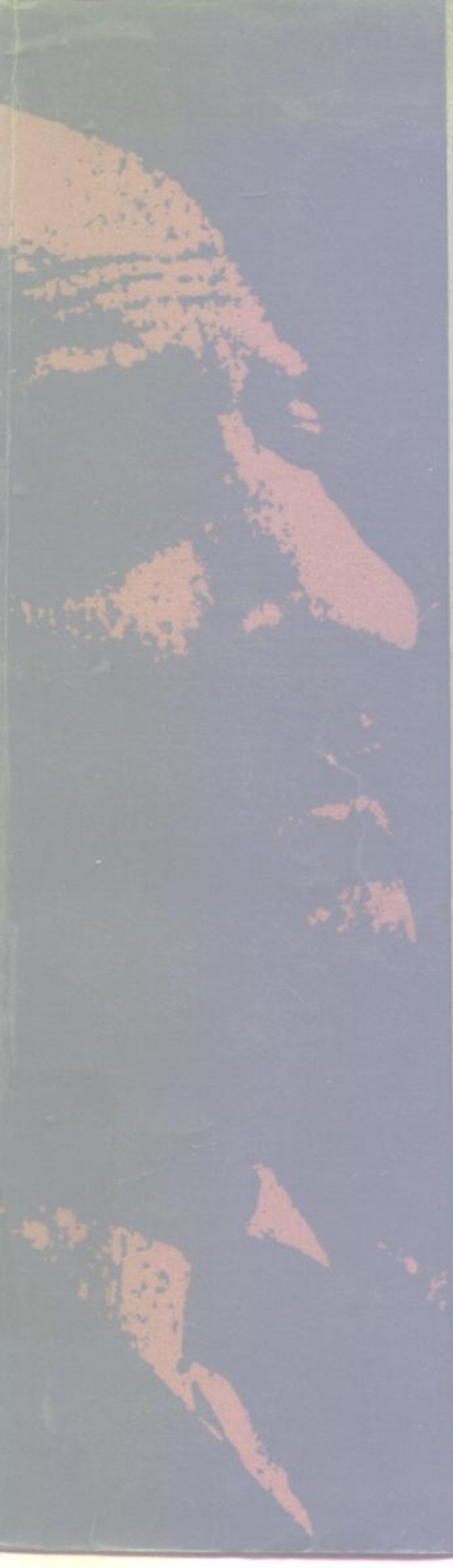




雷蒙·阿隆回忆录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雷蒙·阿隆回忆录

五十年的政治思考

刘燕清 孟鞠如 沈雁南 马燕 孙国琴
杨祖功 赵健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 马 遇

封面设计: 张 红

RAYMOND ARON
MÉMOIRES

雷蒙·阿隆回忆录

LEIMENG ALONG HUIYILU

——五十年的政治思考

〔法〕雷蒙·阿隆 著

刘燕清 孟鞠如 沈雁南

马 燕 孙国琴 杨祖功

赵 健 译

孟鞠如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0.25印张 727,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定价 15.50 元

ISBN7-108-00271-X/D·11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第一部分 政治教育

(一九〇五年——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父亲的遗嘱	3
第二章	学习与友谊	28
第三章	发现德国	61
第四章	在拉丁区正中心	101
第五章	是灰心丧气还是幸灾乐祸	134
第六章	浩劫之路	167

第二部分 政治愿望

(一九三九年——一九五五年)

第七章	战争	205
第八章	幻想不出于抒情	248
第九章	记者和活动家	280
第十章	瓜分欧洲	317
第十一章	二十世纪的战争	356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鸦片”	384

第三部分 祸患之中的教师

(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九年)

第十三章	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	421
------	-----------------	-----

9657/16

第十四章	阿尔及利亚悲剧	447
第十五章	工业社会	495
第十六章	将军的宏伟计划	525
第十七章	和平与战争	566
第十八章	“他没有理解我们”或一九六八年五月	589
第十九章	“自信与统治者”	625

第四部分 当官的年代

(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七年)

第二十章	从皮埃尔·布里松到罗贝尔·埃尔桑	667
第二十一章	后戴高乐主义	699
第二十二章	论意识形态批判	729
第二十三章	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	767
第二十四章	历史评论	799
第二十五章	西方的衰落	830

第五部分 死缓阶段

(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二年)

一、心肌梗塞	859
二、《快报》周刊	870
三、一代人的结束	883

结束语	925
作者书目提要	955

第一部分

政治教育

(一九〇五年——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父亲的遗嘱

我出生在田园圣母大街一幢房子里，关于出生地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已经荡然无存。我出生后不久，父母亲就迁居到蒙帕纳斯大街。我还能回想起那所房屋的若干情景：一条宽敞的门廊隐约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们兄弟几人常在那里溜冰嬉闹，沿着墙壁并排放着三个巨大的书柜，上层装满书籍，下层堆放着纸张及小册子，柜门紧闭。将近十岁时，我就是在那里发现了父亲杂乱地堆积着的关于德雷福斯事件^①的史料。

我们兄弟三个人，三个“小淘气”，年龄相差无几。老大出生于一九〇二年四月，老二出生于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老三出生于一九〇五年三月。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阿德里昂都堪称是一位真正的老大。我们兄弟三人中，最早离开家庭，更确切地说，反抗家庭的是他，而起初母亲最疼爱的孩子可能也是他。因为在阿德里昂出生的前一年，她生的第一个儿子因难产死亡。她为此常常抱怨那位接生医生，认为那个孩子本来可以存活。要讲溺爱呢，阿德里昂也不见得比别人得到更多，不过，父母亲长期供养他生活，由着他游手好闲，过舒服日子。一提起他来，母亲就眼泪汪汪，父亲则为自己的软弱无能做辩解。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① 一八九四年法国陆军部内部有人向德国大使泄露军事情报。法国军界上层武断地认定犹太血统军官德雷福斯为出卖情报的叛徒，未经审讯，即逮捕入狱。法国各阶层捍卫真理之士与反犹势力展开激烈斗争，终于使这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大白于天下。——译者

我未出生时，母亲认定我将会是一个她所热切盼望的女孩。于是，正象阿德里昂享受着老大的优遇一样，我被看做是一个小宝贝。“大孩子们”（母亲这样称呼阿隆兄弟们）有时候欺侮小老么，母亲看不过，便搀着我的手，而我呢，也喜欢陪着她，给她作伴，在一片柔情中相互默契。至于父亲，则对我委以另一种使命，这对我整个一生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我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初步体验到的来自母亲的抚爱与温暖。

在我的回忆录中，首先应该详尽地谈谈阿德里昂。然而，无论是从我大学毕业到战争开始，还是从一九四四年我从伦敦回国，直至他于一九六九年去世，他在我的生活中始终并未占据什么位置。那么，为什么首先要谈到他呢？约在一九五〇年，我的一位表兄曾这样说过：“在一九四〇年以前，每当别人问我：你是阿隆的亲戚吗？他问的是我同那位网球或桥牌运动员的关系。如今，别人再问起这句话时，他关心的却是我同你的关系。”的确，在体育界，尤其是在巴黎体育界中，阿德里昂颇有名气，至少也算得上是个有名人物。在二十年代末四个火枪手时期，他在网球运动员中名列第九，并且，在法国四五名最佳牌手之中，可能也应该首推他与P.阿尔巴朗两人。他曾参加居尔贝特松队与法国国家队的比赛，那是他最为显耀的时期。他虽然不把这些当作职业，但却以此为生，尤其是打桥牌赢钱。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放弃了球拍和纸牌，转而搞邮票买卖，当然，也算业余活动。他生活在社会的边缘，鄙视这个伪善虚假的社会，渐渐滑上玩世不恭的道路。

六十年代中，我们极少再见面。他在动过一次手术（绞窄性疝）之后，曾经表示希望能够到肯尼迪总统路我们的家里来住。我们犹豫不决，未能及时答复，这使他勃然大怒，不再与我们来往。记得，一九六八年五月间，我曾与他短促地见过一面，他对世态的反应依然如故，愤世嫉俗，孤芳自赏。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间，我突然

接到他的电话，他的口气与其说是焦虑或悲伤，不如说是嘲讽取笑，他告诉我说：“这回可没跑了，我觉得腹部有个硬块，可能是癌。”他没有弄错，癌症已经扩散了。在最后的十多天里，他变得暴躁不安，一天要抽两三包香烟，咳嗽不止，即使是外行人听到那种声音，也会猜测到这是吸烟过度所致。

他居住在一家美国旅馆里，我天天去看望他。只有他还省得人事的最后一天，我没能去探望。当时，我正在运动竞选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资格。阿德里昂的死与这种社会喜剧形成鲜明对比，因之更加使我感到自己当时从事的活动滑稽可笑。阿德里昂对此类事物从不参与，对其中种种浮华虚荣也无动于衷。他以自己惯有的态度等待着最后时刻。对此，他面无惧色，甚至焦急不耐，但他害怕捱受痛苦。他恳求我帮助他免除这种痛苦，还向医生要来一瓶阿斯匹林药片，但没有吃。他并没有提前离开我们而去。痛苦煎熬着他，那种模样，惨不忍睹。而他本人却面对终结，始终不渝，不是以一种悔悟的，而是以一种客观和超脱的眼光总结着他六十八年的生活。

他以满意的心情回顾了一九四〇年以前他的人生第一阶段，之所以有这种心情，不在于他感到自己已尽到某种责任或是已完成某种使命，而仅仅是因为对自己感到满足：女人们、财富以及那些体育运动的成就，所有他想得到的，他都具有了。在那个年代里，他经常驾驶着一辆“朗锡亚”轿车（曾多次借给我用），风度翩翩地出入于一些最豪华的网球或桥牌俱乐部。他是一个典型的享乐派。从我的人生哲学出发，我对这类人蔑然视之，但是另一方面，他们那么轻佻自负，举止从容，我不免在心底又隐约感到一丝自卑和谦恭，暗自以欣赏甚或是羡慕的眼光观察他们。

法国的战败，结束了他的青年时代。他突然间成为一个犹太教徒。这并不是由于他在亲人们中间发现有仇视犹太人的事，因

而寻找机会发泄受压抑的感情。后来，他在旅馆床头边才向我倾诉了深埋心底的感受：他在体育界或娱乐界的朋友们（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这是几个真正的、忠实的朋友）对犹太人的命运漠然无睹（持这种态度最为有利），使他感到吃惊，进而开始醒悟。

在一场痼疾之后，他中止了网球运动。又有一天，他在牌桌边突然感到疲惫不堪，于是放弃了桥牌。德国人占领时期，他开初在戛纳居住，随后迁居瑞士，在那里迷上了集邮。他对我说，他感到战后那些年的生活不如战前那么美满如意。的确，这个懒汉终日沉湎在整理邮票之中，以不亚于打桥牌的才能数小时不停歇地埋头苦干。他说，如果没有战争，他本可以通过这些“朋友”中的这一位或者那一位寻求到一种“地位”。这些朋友原与他亲密无间，由于连年事故不断，他们分手了。

在最后那些时间里，他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什么遗憾。他叹惜不依自己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现状，使他失去了生命最后几年中的某些乐趣。尽管如此，他认为自己已活得够长了。总之，他还是保持了“能为人所理解的性格”。正如他生平为人处世，对他来说，衰老并无所谓。这并非由于他远离亲人，才故意做出这种表示。实际上，家庭就某种意义来说仍旧对他保持着吸引力。一九三四年，当父亲故世后，我们三个人一齐在父亲的遗体前痛哭不止（我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他边哭边问罗伯尔和我：“你们说，我是有罪过的吗？”因为，一九二九年，我父亲曾由于交易所行情暴跌而失去了所有财产。在我们三兄弟中只有阿德里昂有足够的钱来帮助父母亲。于是，我向他提出这个情况。他回答说，他仅仅是由于生活方式所迫，才维持着一种表面的阔绰。另外，即使他答应提供帮助，我无法预测父亲会怎样来对待。罗伯尔和我尽一切所能来减轻他内疚的心情。

我遗漏了一点细节，可能这一点还非常重要：阿德里昂生来聪

慧过人。但是，他将自己的才能都用在了桥牌和集邮方面。他在奥舍中学结束正规学习以后，进入初级数学专科班^①。几个星期之后，他表示对那里的学习感到厌烦。父亲赞成他攻读法学士学位和数学士学位。他果真攻读法学士学位。在考试前的三个星期中，他几乎背熟了所有必学的课本内容，并用这种方法通过了三个年级全部考试。但是，由于没有通过普通数学那门考试，他便放弃了数学。他对学习打网球的兴致远远胜过学习数学。直至三十年代初，他一直随家庭过生活。后来，他搬到马里尼安大街一幢楼房的底层定居下来。那套小小的房间，是他的一位朋友布置的，陈饰体现着博览会时代流行的风格。自他搬去后，却被搞得杂乱无章，肮脏不堪，地毯和壁纸破破烂烂，处处表现出房主人的马虎大意，但并非因为阮囊羞涩。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临终。

桥牌和网球。我们家在凡尔赛的那座房屋，是双亲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间建成的。花园里有一个网球场。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在那里打几次球。在这方面，阿德里昂最有天赋，罗伯尔虽然年龄居中，但天赋最差。另外，我在近十岁时，同大家一样也迷上了桥牌。有好几年，几乎每天晚上父亲与我们三个儿子一起打桥牌。父母亲规定，晚饭后的时间里不必“用功”。直到阿德里昂在外边找到了别的消遣方法，家里晚间的牌局才停止了。至于我，自从发现了哲学和思想世界的新天地之后，对网球和桥牌的热情也逐渐冷淡下来。

阿德里昂与他的“生活道路”——在这些首先涌入我脑海的回忆中，我可能还未对我的家庭做出完全符实的描写。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感到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平凡的、传统式的家庭，属于法

^① 数学专科班：法国公立中学里为学生准备投考高等学校或巴黎综合工科学 校所设。——译者

国犹太人中等资产阶级那个阶层。据传说，十八世纪末，祖先们在洛林一个叫朗贝维莱的村镇里定居下来。从此，子子孙孙，世代繁衍。就在那里，我从未见过面的祖父办起过一家纺织品批发商店，由祖父和他的兄弟保罗（斯特拉斯堡的生物学家马克斯·阿隆的父亲）合作经营，生意十分兴隆。随后，这个商店迁到南锡。

关于祖父的事，我知之甚少，仅仅从父母亲以及一位曾在祖父手下做过事，后来移居墨西哥的洛林人那里了解到一点情形。据说，祖父费迪南竟然说我这个继承他的姓的小娃娃^①前途无量。一九六一年，我在墨西哥城遇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曾在“阿隆兄弟”家里做过几年事。他说起主人曾有一次训教他的事：“有一天晚上，已将近半夜了。费迪南突然表示要准备出门。他说：‘大家快去睡觉，时间还来得及，明早起早点。’”我的祖父祖母是东部地区的犹太教徒，但始终在爱国主义上毫不通融。今天，有一种疑问风行一时：你首先应该是一个法国人，还是一个犹太教徒？我想，我的祖父祖母大概从没产生过这种疑问。据我回忆，甚至我的父亲也同样如此。尽管从未有任何历史事件能象德雷富斯事件那样使他付出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的立场却始终如一。他年轻时是共济会会员，没有宗教烦恼，从不信奉、或者说基本上不信奉犹太教。同他在大学里的朋友们相比，同那些出身天主教家庭，或者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朋友们相比，至少，在表面上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同之处。

据说，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双方都是“有钱人家”，但财富有限。外祖父在北方地区拥有一座小纺织厂。因此，母亲在结婚时随身带来一份嫁妆。祖母家里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有一辆大卧车，

^① 我曾被称为雷蒙·克洛德·费迪南。（以下注释除注明“——译者”的以外，均为原作者注）

并有一个戴鸭舌帽的司机，这种排场倒并不是虚有其表。的确，我的父母从双方的家庭里都获得了几十万法朗。祖母去世后，母亲继承了她的一笔遗产，便决定离开巴黎。他们迁到凡尔赛，先住在马延大街一幢出租的房子里。之后，又请一位搞建筑的朋友设计建造一幢房子，然后搬进去住。这幢磨石粗砂岩的房屋，位于哥拉第尼公园路，当时是那条街上最后一所房子，花园的墙外有一个足球场。

我的父亲依照通常犹太家庭中的习惯，从年轻时起就不打算继承父业。他的学习成绩相当出色，在里昂学校名列全班第一。同学中间曾有一人是他的竞争对手，此人后来在巴黎大学教授法国文学。许多年之后，我曾见到父亲保存下来的当时的一些哲学课作文，讲演练习稿以及拉丁诗文稿。他在法科一年级时曾参加巴黎（也可能是全国）最优秀大学生竞赛，并获得一等奖。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父亲进司法界并未成功。这些原因是后来我用尽心机才发现的。他改为参加预备教师资格考试，先报考罗马法和法律史。考试每两年举行一次，他在考试中取得了第二名。但是，那次考试只提供一个职位。一次大课需要准备整整二十四小时，根据规定和惯例，他得到著名历史学家依西多尔·莱维的指导。他先在卡昂法学院任课，随之又决定放弃攻读教师资格，他回到巴黎，在巴黎法律学院获得一个低于正式教师资格获得者的职位（这种职位在几年后被取消）。从此，他一直从事教学生涯，并执教于高等商业学校和高等技术师范。他大材小用，抱负付诸东流。本来，他应当进司法界。但是，他进了教育界，并且自以为找到了合乎禀赋的工作。他常说，这是世上最美好的职业。

难道他甘心如此吗？直至一九二九年以及大萧条时期，在我的记忆中，他仿佛一直是一个愉快坦然、境遇顺利的人。但是，我渐渐萌生了疑问。在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之前，他已有一些有关

法律的作品问世。自从结婚并有了三个孩子之后，他停止了“奋斗”，仅仅发表过一本无足轻重的小书《战争与法律教育》。他离开了巴黎。据说，理由是为了躲避“现代化生活方式”。在凡尔赛，他也没有更好地利用他的闲暇，而是随波逐流，一无所求地打发着日子。当然，失意和压抑的感觉时不时地在他的意念中闪过。但是，在更多的时间里，他对自己和别人都这样说：他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了。我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渐渐了解自己的父亲。在我的眼中，他强有力的形象已被受到挫败的形象取代了。我感觉到在自己的身上寄托着父亲青年时代的希望与追求，因此，我有责任使他重新振作起来。我要以自己的成功来消除他的失意感。我的女儿多米尼克出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最后的快乐。可是，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与世长辞了。

回忆的思潮不断涌来，再次将我带回到一九二九年至父亲去世那个时期。那期间，他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己的财产和我母亲的嫁资，处境非常艰难。父亲已是六十高龄，自从结婚以来，第一次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薪金收入生活。父亲本来属于时代转折时期的资产阶级阶层，他的生活支出超过工资收入。这并不表明他处世不严肃。那么，为什么不花利息呢？恐怕父亲早已习惯于薪金和利息加在一起都不够花。记得，早在恶运降临以前，在凡尔赛时，母亲曾经提醒父亲说：“我想，我们的开支还是不要超过利息收入。”父亲却答道：“不，就按原样开支。”

我的母亲是个节俭的人，她好象是一辆拖动整个家庭的火车头，终日象一个厨娘，一个女仆一样辛苦地操劳着。二十年代时期，三个儿子仍然依靠家庭生活，因此，母亲肩上的担子沉重不堪。在战后通货膨胀时期，父亲经常在交易所里做投机买卖。说“投机”未免言过其实，可能在开初，他先期买进，如果行情看落就存放起来。渐渐地，他买空卖空，超过了自己的财力。一九二九年间，

有价证券一律暴跌，他同许多人一样都遭受到打击。但是，他所承受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三十年来，除了家庭幸福和儿女前途以外，他再无任何雄心和抱负。

我们的父子关系依旧如前，我很少向他提什么问题。有一次，当我稍稍触及到实质问题时，他回答道：“如果我把证券脱手，我就要破产。”其实，他早已破产，不过，他不甘心接受这个事实。于是，他留着证券，亏损加上利息，越亏越多。当时，罗伯尔已进入巴黎和荷兰银行做事，本来应该替父亲出出主意，但是他什么也没做，父子二人始终没有把各自的地位颠倒过来。

当我忆及父亲在生命最后几年中的情景，总觉得自己有罪，并且感到莫大的悲伤。尽管咎由自取，但他毕竟不该吃这样的苦头。任何一个做小额证券交易的人，几句花言巧语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他动心。记得，一个投机经纪人曾把他拖进一笔交易，那一次使他损失了几千法郎。他完全不象一个身遭不幸的人，总是勇气百倍地出去兼课，当家庭教师，帮别人准备考试。有一次，我试图同他谈一谈，他说：“我这是挣饭吃。”

我自小就感到自己罪孽深重。战争期间，母亲收集了一套铅制玩具兵，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无误，她好象还特别喜爱收集各国同盟军人的军帽，为此，我很担心花费太大。一九二二年，部分由于我的缘故，父母亲重新返回巴黎居住。随后，他们又移居凡尔赛，最终卖掉了房子（当时售价五十万法郎），做了最后一次蠢事。当然，我未曾参与过父母的决定。但是，我们的意见既然能够对父母的决定起相当的作用，所以，我并不是毫无过失的。此外，罗伯尔和我在读书期间都接受了父母的供养。有时，我向父亲要支票，交纳室内网球俱乐部的会费，他忍不住提醒我说：“搞这项运动太费钱了。”

“资产阶级”和“犹太人”这两个词，同样频繁地出现于我的笔尖之下。我的家是犹太家庭，但是否可以说它更称得上是一个典型

的资产阶级家庭呢？我无法回答。也许，这个问题意义不大。母亲同两位姨母关系密切，父亲却同大姨母不太融洽（他对此有充分的理由），钱财的纠纷（有关外祖父名下小纺织厂的事）导致了他们关系的最终破裂。父亲与姑母之间也时有龃龉，但这恐怕不应归咎于父亲，因为父亲一向为人大方。

如果我想扮演社会学家，我将会说，父母亲还都属于一种大家庭（在祖父母那一代，一家有六个孩子并不稀罕），兄弟姐妹都舍不得离开，彼此感情太深，决不肯以路人相待。尽管他们有时也会“吵架”，但充其量只不过是共同生活中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至于我们这一代，似乎已前进了一步。除父母亲外，我们在表兄妹之间，甚至在亲兄妹之间，仅仅选择合得来的彼此来往。

在钱的问题上，我只想在此略提几句。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在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囊中空空，依靠薪金度日。偶有一次，在与阿兰交谈之中，我用讽喻的语气将童年时代的旧式资产阶级生活与现在的生活状况（可能被西格弗里德称之为“毫无储蓄的资产阶级生活”）相互比较。我向他表示，我是自得其乐，更确切地说，是感到轻松自由，无忧无虑，我不需为钱着忙，同雇佣劳动者一样，挣多少花多少，但毕竟利用了在学校积累的智力资本。阿兰说，我的运气不错，先享受了富裕家庭中那种有保障的生活，然后，自己就当父母的遗产，不再继承其他任何遗产。也许，我从来没有象其他经历过真正贫寒生活的人那样，终日为“担忧缺吃少穿”而惴惴不安。同时，我也不至于念念不忘美国人所说的那样“跟琼家的人一样阔气”。

阿兰确实言之有理。一九四四年，我从英国返国，当时身无分文。波尔多大学社会学学院院长邀请我担任该院教授，并且向我保证，全体同事们都将乐于与我共事。我未多加考虑，拒绝了这个好意。这使我推迟十年才返回大学，因此悔之不及。但这也反映